

《清人诗集叙录》考论

朱则杰

(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中文系, 浙江 杭州 310027)

【摘要】《清人诗集叙录》是迄今为止介绍清人诗集最为宏富的一部学术著作,但也存在着不少疏漏。本文以读书札记的形式,对其中八家诗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订。

【关键词】清诗;文献;考证

【中图分类号】 K204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008-942X(1999)04-0062-07

Notes on Qing Poetry Redaction

ZHU Zejie

(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Zhejiang University, Hangzhou 310027, China)

Abstract: So far, *Qing Poetry Redaction* is the most resourceful work introducing Qing poetry anthologies. But it has a good many oversights. Formatted in reading notes, this paper researches many textual problems concerning eight poets, rectifying mistakes and adding materials.

Key words: Qing poems; literature; textual research

《清人诗集叙录》为当代著名学者袁行云先生所著,专门著录清人诗集版本情况。袁先生曾以三十余年之时间与精力,遍历北京地区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以及其他若干地方图书馆,前后阅读清人诗集四千余种,日积月累,而陆续写成此书,凡三巨册八十卷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8月首次出版。今此书有关版本信息,已全部录入“全清诗集信息管理系统”。经计算机初步统计,共著录清代诗人2508家,较此前邓之诚先生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六百余家多出三倍以上;所列诗集3106种,其中有卷数者2903种,21402卷,另203种不分卷或无卷数。据袁先生估计,行世清人诗集约有七千种。倘此数字基本可信,则此书著录已得其半数左右,并且不包括许多重复与交叉之版本。如折合《全清诗》,平均以三十卷为一册(计算方法参考已出《全明诗》,每册约五十万字,另原集不分卷者姑且均按一卷计),此批诗集即可编至八百册左右,并且原集均为袁先生所经见,必定存在无疑,可以按图索骥。唯此书若干条目写作时间较早,尤其是出版之际袁先生已经逝世,因此无法再一一核对,难免留下个别疏漏。倘能将此书全部校对完善,再以此为基准补充著录其他未收清人诗集,则全清诗集可以一览无余,其学术价值将更加不可估量。笔者在学习工作过程中,拟陆续将所得写成读书札记。本篇所收,关涉清代诗人凡八家。兹依原书所列先后次序,厘为一束。

(一)朱书(原第555家,第16卷,第1册第555页,1654-1707)

本条著录朱书《朱杜溪先生诗集》3卷,题下标注称“道光十一年刻本”。

关于朱书籍贯,本条叙录称“江苏宿松人”。按宿松位于安徽省西南角,旧为安庆府属县,断无

【收稿日期】1999-04-11

【作者简介】朱则杰(1956-),男,浙江永嘉人,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,文学博士,主要从事清代诗歌研究。

属江苏省之理。疑清朝初年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省,至康熙六年丁未(1667)始一分为二,作者盖由原称江南,换改不慎而致误。

又,关于朱书生年,本条叙录称其康熙“四十六年(1707),卒于京师,年五十一”。据此推算,则其生年当在顺治十四年丁酉(1657)。但据今本《朱书集》(版本详下)卷八《亡妻沈长君事略》有关自述,其生年实为顺治十一年“甲午”(1654),享年54岁。此事《朱书集》附录今人蔡心寰先生所撰《朱书年谱》最末已有考订,可以参看(其中引《亡妻沈长君事略》误为《先考仲藻府君事略》,则当改)。

又,关于朱书诗文集,今人蔡昌荣、石钟扬两先生曾共同校点整理为《朱书集》,收入《安徽古籍丛书》,黄山书社1994年6月第1版。该本《前言》,述朱书诗文集版本源流甚悉。据其中有关介绍,则本条叙录题下所注“道光十一年(1831)刻本”,似当改为“道光三十年(1850)刻本”(道光十一年已编未刻,道光三十年重编新刻)。又叙录正文称道光本有“宋潜虚原序”,下文又称“唯光绪本有康熙三十九年(1700)戴名世原序,为道光本所无”,而其实“宋潜虚”即戴名世,盖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发生后,后人每以“宋潜虚”为其托名。此事《朱书集》有关附录可以参证,而清末戴名世乡人萧穆《敬孚类稿》卷一〇《戴忧庵先生事略》述之最详:“先生姓戴氏,讳名世……又自号忧庵。身后乡先辈及四方学者皆称之为宋潜虚先生,以宋为戴族所自出也。”

又,本条叙录正文征引朱书诗,有关标题《黄河塞》、《小孤山》,据原集应分别改为《塞黄河》、《登小孤山》。另“方苞为撰《墓志》”云云,“墓志”当作“墓表”。

(二)边寿民(原第760家,第22卷,第1册第764页,1685? - 1753?)

本条著录边寿民《苇间老人题画集》1卷,题下标注称“《楚江丛书》本”。

关于边寿民生卒年,今人丁志安等先生所撰《边寿民年谱》^[1],曾据有关资料大致推论为康熙二十三年甲子(1684)至乾隆十七年壬申(1752)。本条叙录详引边寿民挚友王箴舆二诗,考证其生卒年均比年谱迟1年,并且比年谱似更为可信,故此特为拈出,至少亦可备一说。

关于《苇间老人题画集》版本,本条叙录正文称原“有旧抄本,近代冒广生据以刊入《楚江丛书》”云云,此说似未确。按此集今人胡蔚先生曾以冒刻本为底本进行校点整理,收入《扬州八怪诗文集》第一集(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,下同)。冒本末尾附有邱崧生原跋,叙述此集成书过程甚悉,末云:“刻成,赘语以识颠末。光绪己亥十月,后学邱崧生。”据此可知,此集在冒本之前,已有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)邱崧生刻本,冒本乃据邱刻本重刊。上及今本《苇间老人题画集》既以冒本为底本,又同时以邱刻本为校本,亦可证。又,冒本所在丛书刻于民国10年(1921),名曰《楚州丛书》,本条叙录标注所称“《楚江丛书》”,“江”字疑为印刷错误。

此外,关于他人题边寿民有关《苇间书屋图》、《浚墨图》之作,除本条叙录所列诸家以外,为数尚多;边寿民本人散佚诗歌,同样多有可辑。前举《边寿民年谱》于此二项搜罗颇为集中,可以参看。又《扬州八怪诗文集》卞孝萱、陈传席两先生合撰《前言》,末尾曾提到还将搜集编纂《扬州八怪集外诗文》,“陆续出版”,想届时边寿民等人佚作当能成批面世。

(三)汪士慎(原第765家,第22卷,第1册第768页,1686 - 1759)

本条著录汪士慎《巢林集》7卷,题下标注称“道光十三年重刻本”。

关于《巢林集》版本,本条叙录正文称“马氏玲珑山馆……原刻为手书上版,今已不可多得,此道光间金世禄摹刻”。按该集今人陈传席先生曾予以校点整理,收入《扬州八怪诗文集》第一集,集末附有道光十三年癸巳(1833)金世禄、金楷叔侄二跋。金楷跋末云:“今楷于坊间购得先生手书诗版,计历百年未损一字。于溥,楷与先生殆有前生文字缘耶。谨就所闻而识之如此,并属坊友印订行世,以扩海内博雅君子采风之一助焉。”金世禄跋亦云:“其槧板,旧为玲珑山馆马氏藏本。予年少

时,初游广陵,曾于安定讲院吴谷人夫子几席间得读是集……深惜是集之不可多得。今越卅年之久,于吾侄竹篴(金楷别号)处,得睹斯板,完好如初,心疑翻刻。亟询颠末,始知从坊间得来者。玉鱼金碗,仍在人间。如吾侄竹篴者,可谓善阐幽光者矣。属予为记,即拟列入印订成书,以公同好。”据此推测,此道光本似为金氏叔侄直接以原板重印者,叙录题下标注所称“重刻本”当改为“重印本”较妥。《扬州八怪诗文集》本有关说明,亦为此意。

又,本条叙录正文末云:“此集卷首有陈章题词云:‘涉冶群籍,意行自重。不屑世好,深情孤诣。好梅而人清,嗜茶而诗苦。惟清与苦,实溃肺腑。故朴不外饰,俭不苟取。畜用其明,暗然环堵。优哉游哉,庶其近古矣。’可想见其为人。”按此处所引陈章题词,其中“涉冶群籍,意行自重。不屑世好,深情孤诣”四句,实为此集卷首陈撰序中语,其前后有关文字如下:“吾友巢林先生亮体达心,涉冶群籍;意行自重,不屑世好;衡门两版,宛如空山;三四素心,时相过从;焚香淪茗之余,他无所事,故其诗亭亭落落,迥然尘壒之外,深情孤诣,吐弃一切。”同时,陈章题词自“好梅而人清,嗜茶而诗苦”以下凡五韵,韵脚相同(均出上声“麌”部),而陈撰序文“涉冶群籍,意行自重”云云与之并不同韵,由此亦可推想其必属阑入无疑。

(四)金农(原第773家,第23卷,第1册第788页,1687-1763)

本条著录金农《冬心先生诗》4卷、《续集》1卷、《拾遗》1卷、《三体诗》1卷,题下标注合称“同治七年钱塘丁氏刻本”。

关于金农生卒年,本条叙录称其“卒于乾隆二十九年(1764),年七十八”,此说不可靠。按金农生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三月二十二日(1687年5月3日);金农的逝世时间则有多种说法,而以其诗弟子之一罗聘所说乾隆二十八年(1763)“癸未秋”最为可信,享年77岁。今人张郁明先生《金农年谱》考证甚悉^[2],可参看。

又,关于金农诗集,最早所刻者有《景申集》一种。厉鹗《樊榭山房文集》卷三载《景申集序》,略云:“岁丙申,寿门病店江上,余过问之。寒热互战,肤悴且消,而方书药碗间杂厕笔砚,禁掉不已,苦讴愈益甚。索视之,则怀人绝句也。……长兴鲍明府西冈,积学爱人,今之元鲁县、孟武昌也,见而喜之,谓可裨益交道,其辞又最清拔古典,不名一格,乃钁而传之。”(附按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《樊榭山房集》附录五中,朱文藻撰、缪荃孙重订《厉樊榭先生年谱》“康熙五十五年丙申”条,称此序为《丙申集序》,盖以正文牵连而致误)据此可知,金农(寿门其字)《景申集》所收内容为“怀人绝句”组诗,作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(1716),当时曾由长兴知县鲍钺(西冈其字)出资刊刻。后金农在其《冬心先生续集》自序中,也曾提到康熙六十年“辛丑(1721)首春浪游扬州,谢秀才前羲……见予《景申集》雕本”云云。又近人杨钟羲《雪桥诗话》卷五录有诸锦(字襄七)书《景申集》尾绝句二首:“周密著书癸辛巷,许浑题诗丁卯桥。洛诵冬心景申集,新声如此正寥寥。”“软来絮似辛婆果,蒸后样中哀仲梨。可惜都无姜桂性,须君生手一提携。”并称此二绝“皆作于康熙(五十九年)庚子(1720)以前”。凡此都可以印证,《景申集》刻本确曾在康熙末年行世,并且世人评价还相当高。然而,此后《景申集》却不见其流传,所见几种重要书目都未曾著录,甚至近年所出《金农诗文集》(即《扬州八怪诗文集》第三集,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)也没有交代;只有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人别集丛刊》本金农《冬心先生集》的“出版说明”曾经提到过一句,但也明显是据前引厉鹗序推断的。至于其内容,则《冬心先生集》以及后人所辑《冬心集拾遗》分别都收有《怀人绝句》组诗,两者合校,当能得其大概。今本条叙录在叙述金农各诗歌小集版本源流时,也没有介绍《景申集》,故此补充如上。

又,关于本条所录金农各诗歌小集版本,题下标注统称为“同治七年钱塘丁氏刻本”,此不确。按“钱塘丁氏刻本”指丁丙当归草堂所刻《西泠五布衣遗著》丛书本,其中金农各诗文小集系同治七

年戊辰(1868)至光绪九年癸未(1883)间陆续刊刻;即本条叙录所列四种,除正集确实刻于“同治七年”戊辰以外,另三种分别为光绪九年癸未、六年庚辰(1880)、同治十三年甲戌(1874)所刻,因此题下标注以及叙录正文最好应有区别。

又,本条叙录正文引金农七绝二首“出门往往逢麴车”、“隐居多不挂朝端”云云,原属《冬心先生续集·论画绝句二十四首》之十五、十六(前一首又见《冬心先生杂画题记》),而并非单列一题,因此“《七绝二首》”不宜施以书名号。

又,本条叙录也有不少刊误。其中关系较大者,一是标题“《冬心先生诗》四卷”,“诗”字应当改作“集”,以与原书本身以及叙录卷首目录相符合;二是正文开头金农“字寿民”,“民”字应当改作“门”。

此外,关于金农诗歌,除本条叙录所列各有关小集之外,其各种论画《题记》中还散见不少(部分重见或有异文),可以钩稽;其他集外佚诗,也例有可辑。

(五)罗聘(原第 1170 家,第 37 卷,第 2 册第 1306 页,1733 - 1799)

本条著录罗聘《香叶草堂诗集》不分卷,为嘉庆间刻本。

关于罗聘诗集,通常称《香叶草堂诗存》。今人刘永明先生曾校点整理《罗聘诗文集》,与《金农诗文集》一起收入《扬州八怪诗文集》第三集。其中所收《香叶草堂诗存》,其底本实即本条叙录所说“嘉庆刻本”,有“道光十四年(1834)金楷跋”(原板重印)。但仔细比勘,两者之间却出入极大。例如叙录称此集“仅存《扬州市人歌为朱二亭[作]》……及自题……《为万梅年[皋]刺史写顶礼大士图》而已”,通计才得 9 题,而《罗聘诗文集》本却有 112 题之多;叙录引林昌彝《论诗一百又五首》内论罗聘诗“说鬼谈诗妙境开”自注:“工画鬼,诗非其至。……其说鬼诗尚有别趣”^[3],称其“所云说鬼诗,亦未之见也”,而《罗聘诗文集》本则又赫然在焉,题作《秋夜集黄瘦石斋中说鬼》。由此观之,叙录作者所见《香叶草堂诗集》,很可能只是嘉庆刻本的一个残卷。

此外,《罗聘诗文集》所收诗集,还有一个《白下集》。其所据底本据序跋介绍,系罗聘手稿本,现藏上海黄裳先生所。其中作品,部分与《香叶草堂诗存》重复,而文字则颇多出入,可资校勘。同时,据此《白下集》与叙录所及《游岱集》(王昶《湖海诗传》卷三九《蒲褐山房诗话》)、杨钟羲《雪桥诗话》卷七均称“登岱诗”)推测,罗聘在《香叶草堂诗存》编定之前,其诗稿很可能曾以若干小集的形式存在,可惜现在只有《白下集》勉强还可以看到。

本条叙录正文中也有若干笔误或刊误。例如开头关于《香叶草堂诗集》序言作者,其中“吴钧镇”应当改作“吴锡麒”;中间提到“王昶《湖海诗传》卷十九选诗”,“卷十九”应当补作“卷三十九”;末尾关于题咏罗聘《鬼趣图》诸作者,最末“蒋莘、李宗瀛”两人姓氏重出,应当删除一处。

另按叙录全书体例,本条似乎也应当介绍罗聘生卒时间,但目前尚缺。今人陈金陵先生撰有《罗聘年谱》(见前及《扬州八怪年谱》下册),据该谱介绍,罗聘生于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初七日(1733年2月20日),卒于嘉庆四年己未七月初三日(1799年8月14日),享年 67 岁。

(六)黎简(原第 1335 家,第 43 卷,第 2 册第 1494 页,1747 - 1799)

本条著录黎简《五百四峰堂诗钞》25 卷,为嘉庆间众香亭刻本。

关于黎简生年,本条叙录称其“卒于嘉庆四年(1799),年五十二”,如此则为乾隆十三年戊辰(1748)生,但此说不确。按黎简好友黄丹书所撰《明经二樵黎君行状》述其生卒时间十分具体:“君生于乾隆(十二年)丁卯五月二十三日,卒于嘉庆(四年)己未十一月七日”,亦即公元 1747 年 6 月 5 日至 1799 年 12 月 2 日(见《碑传集三编》卷三九,亦可参见拙著《清诗代表作家研究》下编之五、《清诗札记》第八则《黎简享年》,二樵其号)。另其《五百四峰堂诗钞》内部,也有不少作品可以参证。例

如卷六乾隆四十一年丙申(1776)第一题为《三十》,首联云:“年年未三十,三十忽然来。”又卷一〇乾隆四十五年(1780)《庚子生日》首联云:“吾年三十四,半度客中春。”卷二三乾隆五十八年癸丑(1793)《七月九日即目成咏》颌联亦云:“四十七年年七月,去来今日日今朝。”凡此逆数(古人习惯以虚岁计年龄),均与上及《行状》所述相符合。唯后者所云“七月九日”为诗人何种纪念日,尚不得其详。另据今本《黎二樵诗集》(版本详下)有关提示,香港苏文擢先生曾著有《黎简先生年谱》,可惜无从拜读,不然当能获得更多佐证(从他人间接引用中,可知其结论与笔者完全相同)。附识,本条叙录所说黎简生年,在目前所见其他有关著作中也经常可见,不知其最原始出处何在,日后有便当进一步留意。

又,关于《五百四峰堂诗钞》内部编年、作品总数、卷首题词等有关内容,本条叙录紧接上文,称“此集存诗起乾隆二十六年至六十年,共一千六百九十五首,有黄其勤、谢兰生、黄丹、张曰瑤题词”,此处多有疏忽。一是编年所起,“乾隆二十六年”应当改作“乾隆三十六年”,盖此集凡“二十五卷”,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(1771)至六十年乙卯(1795),刚好一年为一卷。二是作品总数,笔者过去曾据卷首总目所列各卷诗歌数字统计,所得为1852首(参见拙著《清诗知识》第3辑第32篇《五百四峰堂诗钞》介绍),两者相差157首,据揣测可能是叙录作者于最末一卷即卷二五的147首未计,此外,在统计过程中又漏却10首所致。今人马以君先生曾校点整理此集为《黎二樵诗集》,收入《顺德文献丛书》,内部印行;其卷首所附苏文擢先生《黎二樵诗集辑刊概况》,该文统计原集数字为“一千八百六十二首”,潘小磐先生《〈五百四峰堂诗钞〉(影印本)跋》统计数字则又与笔者相同。(另《黎二樵诗集》内有许多作品为《五百四峰堂诗钞》所未收,此处均未予统计)唯此种情况,大概只有今后按《全清诗》体例设想将全集诗歌予以统一编号,才能获得最满意结果。三是卷首题词,其作者除原列四人之外,前后分别还有苏膺瑞、孙尔准二人;原列四人中,“黄丹”应当改作“黄丹书”(集内许多作品曾提及此人,又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黎简本传后附有其传,均可参证),盖脱一“书”字,此或叙录作者以为“书”为“撰”字之意,乃致误删。

又,本条叙录称引黎简诗歌,曾列举《华首台至洗衲石》至《广州歌》,以论证其“五七古足以睥睨一世”。但其中《鱼塘海棹歌词》一题,实为七言绝句,凡三首,见于原集卷九。又下文列举“《答同学问仆诗》……《许周生书来言王兰泉近刻湖海诗传欲选拙诗等篇》”,“等篇”二字应移至书名号之后。此外,所引孙尔准《泰雪堂诗集》,集名“雪”为“云”字之讹;所引钱仪吉《读黎二樵诗》“到京一宿去,老死不期官”云云,“官”应当改作“宦”,否则与全诗所用去声“谏”部韵脚不合。似此之类,大抵系印刷过程中产生,与叙录作者无涉。

又,本条叙录论及黎简影响,称“道光后,舒位、彭兆荪、龚自珍均受其影响”,此说不甚确切。即据叙录本书相关记载考察,舒位(原第1580家,第51卷,同册第1777页)早在道光之前“嘉庆二十年”乙亥(1815)即已逝世,彭兆荪(原第1636家,第53卷,同册第1837页)亦卒于“道光元年”辛巳“正月初五”(1821年2月7日),因此都不能或不宜称“道光后”。倘非称“道光后”不可,则此两人可换作钱仪吉、姚燮,与诗歌史也基本符合。

(七)张问安(原第1447家,第47卷,第2册第1632页,1757-1815)

本条著录张问安《亥白诗草》8卷,题下标注称“光绪七年聚珍版本”。

关于张问安生卒年,本条叙录称“生年据《丁酉初度》,为乾隆二十一年。卒年为嘉庆十八年,见问莱跋”。按民国13年(1924)刻本《遂宁张氏族谱》卷一张问安小传,记其生卒时间极为具体:“生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十四日”(1757年2月2日),“卒嘉庆二十年乙亥正月初五日”(1815年2月13日)。本条叙录称其卒年“见问莱跋”,问莱系其季弟,曾于嘉庆二十一年丙子(1816)最先哀刻《亥白诗草》;但其跋语叙及张问安逝世,仅谓“乃船山既歿之次年,亥白亦相继而殒”。考张问陶(问

安仲弟,船山其号)卒于嘉庆十九年甲戌(1814),张问安(亥白其号)逝世既晚于张问陶(《亥白诗草》卷八亦有《哭船山仲弟》五首等诗),自然不可能在“嘉庆十八年”。而叙录所云,则恰恰颠倒之。拙著《清诗知识》第1辑第30篇张问安小传,称其“生卒年未详”,亦当据此补正。

又,关于《亥白诗草》版本,本条叙录正文称“光绪间有重刻本”(刻本),而题下标注称“光绪七年聚珍版本”(“聚珍”为活字印刷),二者有矛盾。不知作者原意是否指同一种,抑或光绪年间确有两种不同版本产生?

又,本条叙录正文所引张问安《丁酉初度》、《书西青散记后四首》二题,实为其原配陈慧殊诗,见陈慧殊《香远斋稿》。盖《香远斋稿》附刻于《亥白诗草》卷一之末,故此不免牵连而致误。附识,近人徐世昌辑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八六录陈慧殊诗,误将其名“慧殊”写作“慧珠”(见中华书局1990年10月第1版),亦当改正。

又,本条叙录正文称张问安“作《三君咏》,为邵晋涵、吴锡麟、冯敏昌”。按之《亥白诗草》卷六原诗,此处所云“吴锡麟”,实即本条上文所述之“吴锡麒”,而吴锡麟在清代则另有其人。

(八)张问陶(原第1564家,第50卷,第2册第1760页,1764-1814)

本条著录张问陶《船山诗草》20卷、《补遗》6卷,题下标注合称“道光二十九年重刻本”。

关于张问陶与前雍正朝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之关系,本条叙录称其为“曾孙”。考前及《遂宁张氏族谱》卷一《世传》,张鹏翮系第9世,张问陶系第13世,盖为其玄孙。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张问陶本传,亦作“玄孙”。

又,关于张问陶与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作者高鹗(字兰墅)之关系,本条叙录称其“为高鹗妻兄,有《赠高兰墅同年及哭四妹筠诗》”。而据《遂宁张氏族谱》卷一张问陶父张顾鉴小传以及卷四张问陶昆仲合撰《朝议公(张顾鉴)行述》记载,张问陶四妹张筠所适为汉军镶黄旗袭骑都尉高扬曾。又此处所引《赠高兰墅同年》与《哭四妹筠》实为二题,分别见《船山诗草》卷一六、卷五,有关书名号应当予以调整。又《哭四妹筠》标题全文为《冬日将谋乞假,出齐化门,哭四妹筠墓》(凡四首),题下有原注:“妹适汉军高氏,丁未卒于京师。”此“丁未”为乾隆五十二年(1787),据诗歌正文可知张筠乃为其夫虐待致死。而《赠高兰墅(鹗)同年》一诗,据本集编年知其作于此后嘉庆六年辛酉(1801)。由此看来,高鹗虽然亦属汉军镶黄旗,但与高扬曾断非一人,否则张问陶必不致再与之酬唱,并以“同年”而不以“妹丈”为称。

又,关于《船山诗草》及《补遗》,今人赵伯陶先生曾合并校点整理,收入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》,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1版。本条叙录正文称《诗草》有“石韞玉、僧道荣序”云云,按之校点本有关序跋,则石韞玉仅有《刻船山诗草成,书后》七言律诗一首,“僧道荣”法名“道嵘”。另叙录所云“石韞玉复选五百余首,名《船山诗钞》,刊入黄氏《士礼居丛书》”者,其书名实为《船山诗(草)选》。

又,关于《船山诗草》及《补遗》旧刻版本,本条叙录正文称“道光二十九年陈葆森重刻二十卷本附补遗六卷”,此说亦可疑。按《补遗》卷首卷尾分别有道光二十九年己酉(1849)编选者顾翰序及陈葆森跋,据其辞推绎,陈葆森所刻似乎仅为顾翰所选《补遗》6卷,而正集20卷并未同时重刻。假如事实真是如此,则叙录题下标注将正集与《补遗》并称为“重刻本”,亦当斟酌。考本条叙录正文所述《船山诗草》及《船山诗注》凡四种版本,其次序和内容与《贩书偶记》完全一致;而此后光绪十八年壬辰(1892)宏道堂刊《船山诗草补遗合编》,《贩书偶记》未曾著录,本条叙录也同样未曾提及,不知后者是否曾受前者影响。另由上及《补遗》序跋可知,张问陶仍有不少诗歌迄今未刻,不知其原稿尚在人间否。

此外,本条叙录正文征引张问陶诗歌,个别字句亦有出入。其中较为重要者如“卷五《论诗》有云:‘文章体裁本天生,只让天才性有情。……’”云云,“体裁”应作“体制”,否则于平仄不协;“天才”

应作“通才”，否则与“天生”重字，做诗者自当避忌。又本题《论诗》，在《船山诗草》属卷一一，凡“十二绝句”，所引两首分别为其十、其五。

以上关于张问安、张问陶两家有关问题，多承其乡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政协文史委员会《蓬溪文史资料》主编胡传淮先生赐教。此外传淮先生将有专著《张问陶年谱》以及考证高鹗非张问陶妻兄的专题论文问世，届时读者可以详参。

【参 考 文 献】

- [1]丁志安等. 边寿民年谱[A]. 扬州八怪年谱(下册)[M]. 江苏:江苏美术出版社,1993.
 [2]张郁明. 金农年谱[A]. 扬州八怪年谱(上册)[M]. 江苏:江苏美术出版社,1990.
 [3]林昌彝. 论诗一百又五首[A]. 林昌彝. 林昌彝诗文集(卷七)[C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.

[责任编辑 徐 枫]

古籍整理研究的新成果

由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的《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》，选录了1998年杭州大学古汉语与古文献国际研讨会论文中的精华部分结集刊发。该书作者大多为高校或科研所的教授、研究员，作者队伍阵容强大，几位年轻博士的论文也写得沉稳扎实，较有分量，一些日本学者及我国台湾地区同行撰写的论文，则角度新颖，考证细密，为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。

《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》一书内容丰富，涉及语言、文学、古籍整理与研究及历史、哲学等多方面，不少论文材料翔实，文风严谨，论证细致，见解独到，解决了历史上久悬未决的疑难问题，并提出了颇中肯綮的观点，识见超群，可谓是一本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集。

《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》一书的出版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重要的价值。而该书所提供的内容，更是集中了中国及汉文化圈内有关古汉语、古籍整理等方面的最新学术成果，为国内外的古籍研究者、大专院校师生、学术团体及汉文化研究者、爱好者提供了最新的学术信息和颇有价值的学术资料。

(苏 言)